

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學習參考材料

江蘇人民出版社

目 錄

三點建議	郭沫若(1)
我們必須戰鬥	周 揚(14)
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	汪子嵩等(34)
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	李 達(49)
胡適思想批判	李 達(62)
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	胡 繩(76)
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	王若水(95)
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	艾思奇(115)
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	李希凡、藍翎(133)
走什麼樣的路	李希凡、藍翎(148)
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	王 瑤(157)
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	林默涵(170)
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	何其芳(187)

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郭沫若

(一)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開了八次大會，足足討論了四個整天。我們批評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紅樓夢”的方法，也檢查了“文藝報”的編輯工作，發言的人很踴躍，很有準備，一般地都做到了暢所欲言的地步。特別是剛才周揚同志的發言，我認為是具有總結性的。他的見解很全面，很具體，很正確，理直氣壯，很有力量，我完全同意。這一次的討論是富有教育意義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的思想鬥爭，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繼續開展，是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本來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們這樣年輩而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真要算是鳳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為了問題的，是他三十年來，特別是自解放以來，在思想、立場和方法上，都沒有什麼改變。這種情況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俞平伯先生對王佩璋的文章的刪改上。那表露了俞平伯先生不僅沒有擺脫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而且還有濃厚的封建思想的殘餘。俞先生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決心進行新我對舊我的鬥爭。我們希望俞先生的新我能夠獲得鬥爭的勝利。

解放以來，我們雖然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進行了

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內，並沒有上昇到能夠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為了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等年青一輩的同志們掌握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對這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犀利的批判的時候，我們不僅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反而壓抑了他們。這就使得問題更加嚴重了。“文藝報”編輯部的同志們已經進行了檢討，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已經決定，準備妥善地處理“文藝報”所犯的錯誤。

好些朋友在發言中都提到“文藝報”編輯部的錯誤在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面也不能沒有責任，我完全同意。我明白認識着我自己應該負的責任就很大。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李希凡、藍翎兩位同志的文章是引起了注意之後我才追看的。“文藝報”和“文學遺產”對於李、藍文章的按語，也是在袁水拍同志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的文章之後我才追看的。這就充分地表明了我自己在思想鬥爭上的漠不關心。

自己被推選為文聯主席，對於文聯機關報所犯的錯誤，能夠說“事不關己”嗎？能夠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嗎？那是不能夠的。“文藝報”所犯的錯誤是我們大家的錯誤，也是我的錯誤。我要感謝領導着我們的黨，領導着我們的黨中央，適時地揭發了我們的錯誤，為我們撞出了警鐘，使我們在錯誤面前睜開了眼睛。面對着以往的錯誤，我們今後應該怎麼辦？怎麼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補救我們的缺點？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

經過四天的集體討論，在怎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上，我感覺着我們已經得到了這樣的一些共同認識：

第一、我們應該堅決地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

第二、我們應該廣泛地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提倡建設性的批評；

第三、我們應該加緊扶植新生力量。

請允許我根據這三點認識來表達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二)

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是刻不容緩的嚴重的思想鬥爭。買辦資產階級的存在、帝國主義的控制、雖然跟着舊中國的死亡而消滅了，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無論在文藝界或學術界，乃至在我們自己的腦子裏，都還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它的潛在勢力。我們不僅沒有和根推翻它，甚至還時時迴護着它。因此在我們從事文藝實踐或者學術實踐的時候，這種錯誤思想，就每每在不知不覺之間冒出頭來。

一九五一年我們曾經進行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第一次揭發。在電影“武訓傳”開始放映的當時，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好些朋友們都沒有看出它的反動性，還曾經加以讚揚。經過那一次的批判，使我們警覺到思想上的毛病，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但可惜那一次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去，時過境遷，批判的聲浪逐漸消沉了，各人的警覺也就逐漸鬆懈了。

目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又一次揭發。這一次的情況是怎樣呢？大家是已經熟悉的，我們所犯的錯誤和電影“武訓傳”放映當時所犯的錯誤並沒有兩樣；而且在這一次的錯誤當中却又有新的成分增加，那就是抑制了蓬蓬勃勃的新生力量。錯誤不僅沒有改正，反而有新的滋長。這不就證明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是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潛在勢力，我們有不少的人事實上不外是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嗎？

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

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為了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倒真是有點像“兩峯對峙，雙水分流”。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潛在勢力是怎樣呢？電影“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思想立場都和胡適的反動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把反封建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古典傑作“紅樓夢”說成為個人懺悔的是胡適，把宣揚改良主義的封建社會的忠實奴才武訓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也正是胡適。胡適的影響，胡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在這兩次的揭發中不就很具體地表露了出來嗎？

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同志的“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扼要地把胡適所信奉的實驗主義的反動性和它的唯心論的本質揭露了，我認為是值得特別重視的一篇文章。我在這裏只想補充一兩點通俗的說明。

胡適在進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販賣的那兩句話，所謂“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自己吹噓，這就是科學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還受着這種研究方法的影響。前幾天就有人向我問過：這種方法為什麼就是唯心論的方法？我的回答是這樣：這是把科學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學是允許假設的，科學當然更着重實證。假設是什麼？假設是從不充分的證據所歸納出來的初步的意見。它還不能成為定論，但假如積累了更多的證據或經得起反證，它有成為定論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學家倒是採取着相反的態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設，大胆的反證”。

胡適根本不懂得科學。但他是反動哲學唯心論實驗主義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師美國的實驗主義者的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學方法也作了唯心論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設一些怪論，再

挖空心思去找證據，證實這些怪論。那就是先有成見的牽強附會，我田引水。他的假設就是結論，結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觀的、片面的、武斷的產物。胡適就是以這樣的方法和態度，否認了屈原的存在，否認了“紅樓夢”的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否認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否認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曾經主張“全盤西化、全盤接受”。他曾經說過：“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他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漢”，就是想牽着我們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順民。我們的鼻子呢？摩一摩看是有點危險的，沒有辦法全盤否認：沒有被這樣一位自封的“好漢”牽着。

其次是杜威所說的“有效即真理”，我認為，那不外就是“強權即公道”。因為對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好戰分子，被認為最“有效”的就是橫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麥卡錫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實驗主義是最反動的哲學思想，能夠在美國吃香。此所以宣揚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

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說法：“戰鬥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認清胡適思想的反動性，清除他的影響，是文化界當前的任務”。

我在這裏要順便報告一項消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在上星期四已經開過一次聯席會議，通過了一項聯合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的計劃。我們擬定了九項內容，分別批判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和其他有關的問題。每項問題由主要研究人寫成文章，公開報告，並進行討論。我們想用這樣的辦法，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加以徹底的清除。我籲請各位朋友注意這件事，請盡力協助，讓我們能夠勝利地來完成這項共同的戰鬥任務。

(三)

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這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這和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應該有所區別的。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我們的目的一定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可以說還是在揭發錯誤階段上的不同意見的論爭，經過論爭的結果，由不同之中而得出同，辨別誰是誰非，以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如果正確的結論一時得不出，儘可以使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期內同時存在。不同意見的同時存在並不一定會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因為矛盾在真理的照明之下總是要得到解決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真理來促進矛盾的解決。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可能產生，又需要在新的情況之下給予解決。這樣蟬聯下去，就使我們的學術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斷提高。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凡是自由討論的風氣旺盛的時代，學術的發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學術的進步，連社會的發展也因而停頓了。

在紀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末期的戰國時代，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是自由討論最旺盛的時代。那時代的周秦諸子差不多每一位都是雄辯家，都是文章的能手，他們彼此之間的論爭是很激烈的，形成了所謂“百家爭鳴”的情況。因而那個時代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也就形成了一個特出的高峯。

在長期停頓的封建社會中，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自由論爭。例如紀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議便是有名的一例。當時漢朝的中央政府召集了天下的開明紳士所謂“賢良”和孔孟之徒的讀書人所謂“文學”六十多位聚集到京城，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辯論鹽、鐵和酒的專賣政策。從民間來的

代表地主和工商業家利益的人們是反對政府所執行的這項政策的，大大地展開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場論爭。論爭的結果，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是儒家思想佔了上風。但有了那一次的討論會，却產生了一項值得重視的文化成果，便是桓寬的“鹽鐵論”。桓寬的這部著作被一般人誤解為經濟論文或者會議記錄，其實並不是那樣。那是桓寬在若干年之後的宣帝時代（紀元前七〇年左右）根據會議記錄提煉出來的一部對話式的文學作品。那裏面有典型人物的創造。把六十多位代表地主階級與工商業界的民間代表，概括地抽象成為了所謂“賢良”與所謂“文學”的兩個人。把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形象，特別在他的思想方面，刻劃得相當生動。因此，我在這裏要順便向研究古典文學的朋友們請求：請把桓寬的“鹽鐵論”作為寫經濟題材的文學作品處理，在我們講漢文學史的時候，千切不要再忘記了這樣一部最古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存在。

紀元五八二年至五八八年隋文帝的開皇年間也曾經舉行過大規模的討論音樂的會議。參加討論的人有宰相，有博士，也有音樂奴隸。爭論了七八年，沒有得出什麼結論。但那一次的討論會，毫無疑問，是促進了隋唐兩代的高度的音樂文化的。

歷史上的引證太多了，說來使得大家沉悶，我不準備多說了。但我要請大家回憶一下在解放前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活動的近狀。在那短短的三十年的期間曾經有過不少次的激烈的論爭，有時是對敵的戰鬥的。戰鬥和論爭的成就是怎樣呢？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已經說過：“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毛主席的講話是有分寸的，他肯定了五四以來的文化活動的成就，然而絲毫也沒有誇大它的成就。五四以來的文化活動是把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

了，“力量逐漸削弱”了，然而並沒有把它們消滅。

解放以來的情況是怎樣呢？幾年來在廣大知識界進行了思想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了廣泛的傳播，這是必須肯定的成就。但是和別的部門在建設事業上的蓬蓬勃勃的發展比較起來，我們的學術文化部門在思想論戰方面的空氣却未免太沉寂了。對於資產階級錯誤思想我們既沒有進行有系統的、認真的批判，甚至還有人採取了投降主義的態度，而在各種文學藝術團體內部、各種學術研究機構內部、各種報刊和著作上面，都很少看到有不同意見的論爭。

缺乏論爭是不是由於缺乏不同的意見呢？顯然不是的。各個文化領域裏面，大大小小的各種問題，各種不同的意見很多。例如拿歷史研究來說，關於古代史的分期問題，關於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關於漢民族形成的問題，等等，國內國外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便有不少的不同意見。又例如在經濟方面，在目前正討論着的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單是“學習”雜誌社聽說便積累了八十多篇稿子，最近已採取了一項很好的辦法，出了一期“專輯”。

這就說明，在我們的各種文化領域裏面是有各種不同意見存在，但沒有很好地展開討論。

為什麼沒有很好地展開自由討論呢？不少的同志已經提到，由於我們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弱點。首先是對敵對思想採取了投降的態度，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其次是權威感作怪：對一些“大人物”感覺着他有權威，不好讓人碰他；或者自封為“大人物”，感覺着自己有權威，不肯讓人碰我。再其次是情面問題：對於同志和朋友照顧得太多，因而對於非朋友和非同志便自然照顧得太少。再其次是在暗默中採取了無原則的多數表決：假如一個問題有多數人是主張甲，而少數人是主張乙，那少數人便會無批判地被認為多此一舉；處理問題，像這樣不從真理的標準出

發，而是從便利的算盤出發。有了這些思想上的弱點，那必然的結果便是阻止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執行和進展；便是輕視“小人物”，壓抑青年，而終至於脫離羣衆；便是無原則地抹殺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形成假相的多數，只許我批評而不許你反批評。這樣下去，自由討論自然就無法展開，不同意見也就會被關閉進保險箱裏去了。

今後我們要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就須得有步驟地想出一些具體的辦法出來，逐步消除這些障礙，消除我們思想上的這些弱點。

(四)

再從積極一方面來說，爲了自由討論能夠順利展開而不發生偏差，我們就還須得盡力提倡建設性的批評。

我們一般的朋友似乎不大習慣於討論，也不大習慣於批評。每每一批評便是相罵，一討論便是吵架。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厭惡批評和迴避討論的情緒，似乎是無可否認的。這也就是須得消除的一種障礙。

建設性的批評要怎樣才能建立呢？我想提出這樣十六個字，請大家考慮。那就是：明辨是非，分清敵友，與人爲善，言之有物。

學術批評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明辨是非。要明辨是非，我們就必須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標準。或許有人會說：我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就沒有資格參加批評了。不，不懂，就加緊學習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是不拒絕任何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也並不是不可能的難事。一個人只要肯有系統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在實踐中深切體會，竭誠地擁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擁護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存心爲人民服務，爲國家建設服務，抱着自我犧牲的精神，在自己的

學術崗位上或文藝崗位上實事求是地進行工作，那他的思想、立場和方法就會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轍。馬克思列寧主義歡迎犧牲自我的人，歡迎實事求是的人，歡迎勤勞不息的人。不論“大人物”或者“小人物”，不論黨員或者非黨員，在真理面前是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

要達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我們還必須分清敵友。這就是說：當我們執行批評的時候，在對人的態度上也要採取辯證的方法。我們的敵人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動思想，我們一定要毫不留情地集中火力來打倒它。對於願意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朋友，我們應當歡迎；如果他們在思想上有錯誤，我們應當採取說服和幫助的態度。對於自己人乃至自己，如果犯了思想上的嚴重錯誤，我們的批評態度那就應該特別嚴格了。我們是不能夠容恕自己的錯誤的。容恕自己的錯誤，那等於寬縱了敵人。要嚴格地執行自我批評，我們在黨員同志之間的批評上，在黨對黨員的批評上，可以看出典型的示範。那嚴格的程度，在鍛鍊二字中可以體會到。一個優秀的黨員他是受過千槌百鍊的，也是經得起千槌百鍊的。“百鍊鋼化為繞指柔”要那種經過鍛鍊的人，經得起鍛鍊的人，他才能夠善於批評別人，也才能夠善於接受別人的批評。黨外人士是應該向這樣的優秀黨員學習的，也就是說我們也要有經得起鍛鍊的準備。儘管別人批評我從寬，但我批評自己不能不從嚴。假使別人批評我也從嚴，那是別人把我當成自己人看待了，我是應該特別感謝的。衣裳上有灰塵，別人替我們拍去了，我們會說聲“謝謝”。面孔上有污點，別人替我們指出了，我們也會說聲“謝謝”。思想上有錯誤，別人替我們揭發了，我們難道不應該特別感謝嗎？但是有這樣的朋友，已經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且還說要堅決地要求入黨，但一受到批評便以為受到打擊，頑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迴護自己的錯誤，我想這樣的朋友恐怕還沒有具備入黨的資格的吧？請不要誤會，我

們說“可以允許少數人堅持不同的意見”，但並不是說“恭維少數人堅持錯誤的意見”。一個人要堅持自己的錯誤意見，當然也有他的自由，但那是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關聯的。

批評要採取與人爲善的態度，我想無須乎再多說了。批評自己嚴，是希望自己好。批評友人寬，是希望友人好。寬便容易接受，正確的批評被接受了，錯誤被改正了，那還有什麼不好呢？真正是一好百好，大家都好。儘管就是敵人吧，只要他放下武器，我們都可以既往不咎，允許他從新做人。我想，這恐怕就是與人爲善的最寬的限度吧。

在學術批評上，言之有物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你總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確鑿的證據，有堅實的內容，有正當的道理，才能夠說服人。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東西可說，最好就不要說，等研究好了再說。如果是無理取鬧，唯我獨尊，徒逞意氣，無的放矢，那不能說是討論，也不能說是批評，只能算是吵架或者相罵了。

爲了使學術討論能夠勝利地自由展開，我們一定要掃除這些相罵和吵架的習慣，我們一定要明辨是非、分清敵友、與人爲善、言之有物、然後建設性的批評才能夠建立得起來，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才能夠不發生偏差。這是每一位朋友都應該努力的事。說是容易，做是困難的。我們大家請加倍地努力吧。

（五）

最後我要簡單地說一說關於扶植新生力量的我們的共同認識。

培養建設人才，這是我們國家建設上的一項基本的文教方針。無論在任何方面我們都必須培養新生力量，必須把培養新生力量作爲一項重要的中心任務。

但在培養之中包含着愛護、教育、鍛鍊的過程，我們却不要

忘記。

新生力量是十分可愛的。我自己經常愛說“青年是人類的青春”。青年對新鮮事物的感受性真是特別的犀利。就拿這次“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來說吧。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已經三十年，據他自己說是“越研究便越覺糊塗”。李、藍兩位同志都只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他們研究“紅樓夢”據說只有兩年光景，但他們一箭就射到靶子上了。這就證明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正確，立場正確，也就證明青年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上，比起“大人物”來，來得特別快。這樣的青年不是應該特別加意愛護的嗎？

我感覺着我們許多上了年紀的人，腦子實在有問題。我們的大腦皮質，就像一個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籃一樣，全面都巴滿了各個碼頭上的旅館商標。這樣的人，那真可以說是一場糊塗，很少有接受新鮮事物的餘地了。所以儘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有五年的歷史，但總是學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愛這樣說：“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我想，這倒不是一味的客氣。確實是先入之見害人，舊的東西霸佔着我們的腦子，不肯讓位。想到這些上來，便愈是覺得青年可愛，可敬，可畏，老年人哪裏還能容許有什麼權威感呢？新陳代謝是絕對必要的，無論在生理機能上，社會機能上。老年人應該為青年人開道。盡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好的東西傳授給青年，替他們排除障礙，而不是增加障礙。

但是我們也不要使愛護發生偏差，我們要善於愛護。古人早就說過：“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你愛護青年，難道就不肯鍛鍊他嗎？你誠心地對待青年，難道就不肯教育他嗎？溫室裏面的花經不得風霜，一味地溺愛，那是會貽害青年的。

我們中國的作家或者學者，往往有後勁不來的傾向。好些人一出馬的時候好像都是天才，但是愈來愈不像了。民間也有這樣的成語：“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凡人，四十

歲的老而不死。”這話裏面的教育意義是很深的。這說明了一個人的努力不足是不能有所成就的；也說明了愛護的方法不妥當也會埋沒天才。一個人在艱難的環境中有時還比較能夠玉成；在一帆風順、一片頌聲中倒反而容易湮沒。別人都稱讚你是“神童，神童”，這就容易使人自滿，使人驕傲，使人懈怠。一個人一驕傲自滿而且懈怠，那還有什麼前途呢？

所以在加意扶植新生力量的時候，千切不要忘記、除加意愛護之外，還須得加意教育，加意鍛鍊。

再從青年方面來說也是值得自行警惕的。宇宙間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努力爭取的東西實在太多。學習是沒有盡境的，好處也是沒有盡境的。青年時代的特徵就是肯學習，肯努力，戰鬥性強，好勝心旺，樂於比賽。這是優點。爲了祖國的建設，爲了文化的進展，爲了和平的勝利，請長期保持着這樣的優點吧。要有經得起鍛鍊的準備，接受在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千槌百鍊。

就在我們的討論會上，我感覺着已經有了這種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發言中透露了這樣的意見：只要對於青年批評，那就是壓制新生力量。我看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把問題作了片面的了解。青年當中也還有些壞的成分，這雖然是舊社會的遺毒使然，但我們不能夠置之不管。假使說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連不良的青年或青年的不良傾向也不能矯正了，那應該說是相當大的錯誤。

我們提倡扶植新生力量，但也並不是說年老的人便都應該趕快死掉。我同意聶紺弩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的發言中所說的話：“老生力量也應該重視”。但我想補充一點意見，便是老生力量應該向新生力量學習，那他就會長久被人重視了。人是容易衰老的，很快就到了老而不死的地步，別人要想重視也重視不起來。老年人恢復我們青年時代的特徵，我想是可以辦到的，只要

我們肯努力學習，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認真地武裝自己，端正我們的立場觀點，提高我們的工作熱情，加強我們的戰鬥性，健全我們的好勝心，即使接受新鮮事物的敏感性要遲鈍一些，但總不至於過早地陷沒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青春的時代，而且是一個永遠上升的青春時代。

我籲請青年人長遠保持着戰鬥的青年精神。

我籲請老年人把青年時代的特徵恢復轉來。

（新華社）

我們必須戰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周 揚

我們正在進行的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現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鬥爭，同時也是反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可恥的投降主義的鬥爭。郭沫若同志在十一月九日發表的談話中關於這次鬥爭的目標、任務和意義作了精確的說明，這就是我們在今後鬥爭中所應遵從的方向。我們的大會已開了八次，許多同志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我現在也說一點我的意見和看法。在這個鬥爭中，我們是不應當沉默的。

一、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

這次鬥爭使我們不能不想到三年前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

想批判的運動。

文藝上的思想傾向的鬥爭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過程的。從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後，我們的國家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歷史階段。對資產階級唯心論及其在文藝上的反現實主義傾向的鬥爭就成為思想戰綫上一個比以前更加迫切的嚴重的任務。

電影“武訓傳”是在開國之後不久上映的。剛剛獲得解放的人民渴望從文藝作品中看到中國人民爲了自己的解放在歷史上曾經走過一些甚麼道路，哪一條道路走對了，哪一條道路走錯了？影片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給了極端錯誤的解答。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了對封建統治者的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鬥爭的正確的歷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蔑。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另一部電影“清宮祕史”也帶有同樣反動的性質。這部影片雖然在全國一度上映之後就停演了，却沒有像“武訓傳”那樣受到嚴正的批判。影片誇大了改良派的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把光緒皇帝加以理想化，而完全顛倒了和誣蔑了義和團反抗外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的歷史，給觀眾以這樣的印象，似乎外國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義和團，佔領北京，驅逐中國政府是正當的。影片表示的思想是投降外國侵略者的賣國主義的思想。

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懂得，我們今天的勝利是和我們祖先的過去的鬥爭分不開的。我們十分重視中國人民革命的傳統，決不能容許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反人民的、反愛國主義的觀點來歪曲和抹殺這個傳統。

假如說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關涉到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的問題，那麼，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就關涉到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的問題。我們在建